

亚洲对帝国主义的回应： 孙中山和马哈迪反帝国主义论述比较分析

陈中和

内容摘要：19 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对亚洲各国形成重大的冲击，他们透过殖民化、侵略、压制和剥夺来取得对亚洲诸国的经济和政治的支配地位，他们甚至也重划了亚洲诸国的领土，重组了亚洲的社会结构。虽然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以及各项科技和现代产品，协助催化了此区域的现代化发展，帝国主义的扩张也为亚洲各地带来了民族的觉醒，以抗拒白人和西方至上的支配霸权，自 20 世纪初期至中期亚洲各地遂兴起了一故民族自决，反帝国主义的浪潮，作为团结国家的理想，一些著名的亚洲领袖发展出一套反帝国主义的论述以合理化他们的发展愿景和政策路线，这些论述经常结合在地的价值、文化和理念。

本文透过整理他们各自的反帝国主义论述以及国家发展的理论，来比较和分析两位亚洲著名的国家领袖，现代中国的开创者孙中山医生和马来西亚任职最久的首相马哈迪医生的亚洲观点，从中审思亚洲独特的国家发展途径。研究显示孙中山和马哈迪皆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皆以反帝国主义的论述为其治国理念构成的主要部份，他们皆相信西方帝国主义是国家的主要外在威胁，因此他们在国家发展上皆积极倡导非西方的价值，如孙中山积极推动中国的传统价值，马哈迪则强调马来价值和伊斯兰的理念。然而，孙中山的最终目标是塑造一个不分族群和宗教皆为平等的民主国家，反之，终其任期，马哈迪经常用反帝国主义为借口来合理化其对国家进行威权统治，研究也显示在国族整合的态度上，孙中山倾向于把所有族群整合成一个民族，马哈迪则倾向在马来支配权和伊斯兰的领导权之下，透过各族群权力分享和协商的方式来整合国内的族群，这两种不同的国族整合观点分别在两个国家发展成不同的国家政策，并对它们各自的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 孙中山; 马哈迪; 帝国主义

作者简介: 陈中和博士,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助理教授兼中文系系主任及中华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组组长。主要研究方向: 孙中山与中国当代政治思想、马来西亚华人研究、马来西亚族群研究、马来西亚伊斯兰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邮箱: chincf@utar.edu.my

Title: Asian's Response to Imperialis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r Sun Yat Sen's and Dr Mahathir Mohamad's Anti-Imperialism Discourses

Abstract: Since the 19th centuries, Western imperialism has inflicted tremendous upheaval to the countries in Asia. Through colonization, invasion,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the West has usurped the Asian countri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They even reconfigured the boundaries and social composition of the Asian countries. Although Western ideas and system as well as modern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were introduced and helpe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egions, imperialism has also caused an awakening of the Asian people, to rise and oppose white and Western supremacy. From the early to mid 20th century, a wave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anti-imperialism movements swept across the Asian regions. Using this sentiment as a rallying point, some prominent Asian political leaders began to formulate anti-imperialism discourses to rationalize their developmental and policies program. These formulations often incorporate distinct local cultural ideas and values.

This article 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founding father of modern China, Dr Sun Yat Sen's and longest served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Dr Mahathir bin Mohamad's, discourse on anti-imperialism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program for nation-building. The aim is to decipher the two leaders' contribution to a distinctly Asian wa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Dr Sun Yat Sen and Mahathir Mohamad are strong advocates of nationalism, with anti-imperialism being a key factor in the shaping of their political ideology. Both leaders firmly believe that Western imperialism is the major external threat to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for that reason their emphasis on national developments were steered towards non-Western models and values. For example, Dr Sun champion for the reaffi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eritages while Dr Mahathir focuses on elevating the Malay culture and the Islamic ideas.

However, Dr Sun ultimate aims to form a democracy where there is equality regardless of ethnicity or religions. On contrary, throughout this tenure as prime minister, Dr Mahathir used anti-imperialism as an excuse to consolidate his authoritarian rule. This article also found that in term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Dr Sun's policy is to assimilate all the ethnic groups into a single nation. Dr Mahathir however prefers to adopt a moderate integration through power sharing and coope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Malay supremacy and Islamic hegemony. Thus fa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tatesmen's ideas have contributed to two divergent path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with huge impact o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Keywords: Sun Yat Sen; Mahathir Mohamad; imperialism

Author: Dr Chin Chong Foh, Assistant Professor, head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and head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Unit, University of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Major areas of research: political science, Dr Sun Yat Sen's and Modern China political thought,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Malaysian ethnic studies, Malaysian Islamic studies, and cross cultural studies. Email: <chincf@utar.edu.my>

前 言

辛亥革命创造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作为近代亚洲民主化的先锋，中华民国第一位总统孙中山（1866-1925）留下了大量超越同时代中国人，以救国济民为根本，历百年而不朽的政经思想。纵观这些标榜以三民主义为首的政治理论，孙中山所鼓吹的救国途径并非全盘西化，而是将西方当代的政治理论和中国社会传统加以融合，并不断透过实践来加以完善之，从而打造一个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家，使之作为其他亚洲国家的楷模，以拯救亚洲国家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压迫。对此，孙中山堪称亚洲第一个建立反帝国主义论述，并积极提倡亚洲观点或亚洲价值的国家领袖。

作为马来西亚第一个平民出生的首相马哈迪（1925- ），他除了拥有和孙中山同样的医生背景之外，也和孙中山一样，是属于一位积极追求救国济民之路的民族主义者。他在位期间也以反对西方

霸权，提倡亚洲观点而成为国际知名的领袖。论反帝国主义话语之多元，国家发展理论之丰富，马来西亚历任首相没有人能出马哈迪之右。他也同样地将西方政治理想加以修订转换为适合马来西亚国情的政治体制，并义正词严地加以捍卫之。

本文首先叙述帝国主义的本质，就两位名闻亚洲的国家领袖，孙中山医生和马哈迪医生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内容和相关的响应之道，以及他们独特的治国观点作一分析比较，从中审思亚洲开发中国家的发展途径，以及西方政经制度在新兴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所应扮演的角色。

一、帝国主义及其论述

一般而言，帝国主义（imperialism）就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群体对其他国家或群体的主宰关系”，^①或以 E.M. Winslow（1948）的说法，帝国主义是一种“单方面地强制约弱，自由制约奴役的控制关系”，它的好战特性也使它成为军事主义（militarism）的同义词。^②进一步来说，以 Barbara Bush（2006）所言，帝国主义的扩张就是对殖民地区的剥夺，这种剥夺的方式可透过进贡、赋税、土地征收、对贸易或生产的控制来加以进行，^③“从过去的罗马帝国到今天的美国军事强权，军事和科技的主宰性是维系帝国权力不可或缺的要素。”^④

John A. Hobson（1902）在他的不朽名著《帝国主义：一个研究》中就指出 19 世纪中叶以前的帝国主义就是指对外领土统治权的取得和对外人民的移殖，因此它也可称为殖民主义（colonialism），但欧洲帝国在 19 世纪中叶所进行的计划性领土扩张政策，却和过去的殖民主义有所不同，首先，这些领土的取

① Iain Mclean,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36-37.

② E.M. Winslow, *The Pattern of Imperialism: A Study in the Theories of Power*, New York: Octagon Book, 1972, p. 3.

③ Barbara Bush, *Imperi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6, p. 25.

④ Ibid., p. 30.

得方式多元化，它们或以“被保护国”（protectorates）的名义，或以公司条约的方式来加以获取，而非母国直接管辖的殖民地，其次，这些被占领的地区多属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并不适合白人的移殖，当地也遍布“下等民族”（lower races）^①，并不适合将母国的西方文明力量（Western civilized power）如政治权利和市民自由引入，因此这个时期的领土扩张是一种独裁专断统治的扩张，和加拿大、澳洲、南非等的殖民方式迥异，其三，它们的占领是透过极少数的白人官僚、贸易商、工业领袖对极大量被视为低等、无能力进行政治和经济自我管理的人们进行政治和经济上支配。^② Hobson 认为，这种非直接占领的扩张政策，主要是由取得技术进步，拥有大量生产能力的极少数欧洲工业领袖（captains of industry）所推动，他们虽透过不断的并购而累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彼此之间却是割喉式的竞争（cut-throat competition），基于投机和快速获利的心态，他们企图征服世界各地，除了为了掠夺当地丰富的资源外，也是旨在寻求新的市场以大规模倾销他们的产品，而这种型态的领土扩张政策，就是“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③

同理，E.M. Winslow 也指出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追求利润极大化思维下，被殖民国（按：Winslow 认为这些被殖民国不管它是以被保护国的名义还是以直接管辖的名义来支配，事实上它们的地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的一切皆是母国的财产，并尽可能对它的土地加以剥削（to be exploited to the fullest extent）。^④ 而 19 世纪欧洲诸国彼此之间实施过高的关税壁垒，也促使这些大规模生产的工业积极寻求额外的市场来倾销商品。^⑤ 1916 年的列宁（1870-1924）也认为帝国主义不全然是领土兼并，而是资本主义发展进入

① 值得注意的是，John A. Hodson 是以括号来说明 lower races 这个专有名词，显见这虽是当时流行的词汇，其内容却充满争议性。见 John A. Hodson, *Imperialism, A Study*, New York: James Pott and Co, 1902, in,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hobson/1902/imperialism/pt1ch1.htm>, 上网阅览日期：2015 年 9 月 23 日。

② Ibid.

③ Ibid.

④ Winslow, *The Pattern of Imperialism: A Study in the Theories of Power*, p. 15.

⑤ Ibid., p. 34.

生产和资本独占化的结果。他指出资本主义下市场自由竞争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大企业并吞小企业，而最终导致生产和资本的独占化。资本家利用控制各国市场的手段来累积财富，致使世界版图将会由少数几个资本主义强权所分割把持。因此，帝国主义最深层的经济根源就是资本家对生产和资本独占的需求，^① 即为极少数的富裕国家对大多数弱而小的国家的主宰关系，这些独占的资本家只坐享他国人民劳动的成果，是一种“寄生，衰退的资本主义”（parasitic, decaying capitalism），^② 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其走向毁灭的最后阶段。是以，在列宁的鼓动下，“反抗帝国主义”成为列宁式共产主义的核心要求，^③ 它作为左派团体发动革命的主要理论依据，影响了许多共产国家如中国、东欧诸国等好几个世代的人民。^④

虽然如此，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帝国主义带来了正面的效果。Bill Warren 辩称，帝国主义是西欧对其他国家传播技术、文化、和体制的方式，这些复兴、改革、启蒙和工业革命的文化给世界各地带来了革命的种子，提升了各地的人文价值，^⑤ 在殖民统治期间，也有许多非洲和印度的知识分子“狂热地”（enthusiastically）欢迎帝国主义以改革他们的旧文明。^⑥ 同理，E.M. Winslow 也认可西

① V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London: Junius Publications Ltd, 1996, p. 101.

② Ibid., p. 104.

③ 必须要注意的是，虽然战后主要的共产党国家都以“反帝国主义”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轴，但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留下对帝国主义的论述，左派的反帝国主义理论主要是由列宁、布哈林（Nicolai Bukharin）等共产主义信徒所催生的，由此也构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或马列主义的主体内容，它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是有所区别的。相关数据可参考 Anthony Brewer,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 88-135.

④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描述，大体符合当时的状况，惟他无法预见西方普遍选举的民主制度迫使政府重视并提高工人的福利，成功舒缓了劳动阶层的民怨，加上教育的普及活络了阶级间的流动等的环境因素，使资本主义国家得以自我修正其各种弊病，并大大地延缓了其毁灭的期限。目前看起来虽然投机、贪婪至上的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因间歇性的金融风暴而持续遭受重大的打击，许多国家的经济也蒙受重创甚至濒临破产，但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离列宁所说的自我毁灭阶段，仍然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⑤ Bill Warren,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NLB, 1980, p. 136.

⑥ Ibid., p. 137.

方自由和民主的理念给殖民地带来很大的冲击，惟这些西方的价值却反而成为当地反抗帝国主义的利器。^①

E.M. Winslow 认为帝国的思想，乃以文明的本邦人和野蛮的外邦人来加以区分，不管善意抑或是恶意，皆视外邦人为次等人，或奴隶，并以这种心理来规范和指导他们的行为。^② 在这种思维下，1899 年著名文豪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甚至以“白人的负担”（white man's burden）为题创作了一首诗来歌颂帝国主义改革他国文明，“为他人谋取福利”的努力。^③ 于是乎，欧洲诸邦的帝国主义带来的不止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全球的主宰，还包括了在族群上和价值上的支配。对此，Barbara Bush 主张帝国的信仰就在于相信其所代表的民族和文明远较其他民族或文明优越，因此其他的民族必须在帝国的统治秩序中属于永久的从属地位，^④ 是以，“帝国主义所建构的是欧洲中心（Eurocentric）的世界，而所谓的现代化就是指文明的西方对抗落后的其他文明的过程”，^⑤ 当代全球的政经秩序就是以这个欧洲的现代化观点来加以建构，并持续主宰着全球的命运。

不可否认地，帝国主义的扩张也为全球各个殖民地或属地带来了民族的觉醒，帝国主义让殖民地人民成为集体属民，无形中制造了一种殖民和被殖民、权力者和无权力者的二元冲突，^⑥ 白人民族主义的统治也激起了当地人作为民族共同体的自觉，教育的普及和行政制度的深化也加速了民族思想的传播，因此如 A.P. Thornton 所言，不难发现殖民地所有追求建国的民族主义菁英领袖都是受殖民者教育的熏陶，或属于殖民统治机构的一员，他们所要争取的，不单是民族的独立自主，而是民族的尊严，即能和殖民者拥有平等能力以及平等地位的尊严。^⑦ 于是乎，20 世纪殖民国家的民族主

① Winslow, *The Pattern of Imperialism: A Study in the Theories of Power*, p. 13.

② Ibid., p. 7.

③ 这乃是引用他的诗的一段：“To seek another's profit, and work another's gain”。

④ Barbara Bush, *Imperi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p. 27.

⑤ Ibid., p. 96.

⑥ Ibid., p. 37.

⑦ 上文的论述乃是综合 A.P. Thornton 的观点而来。见 A.P. Thornton, *Imperi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义运动多以对抗帝国主义的压迫为号召，即使在非殖民地国家的中国，亦不例外。^①

综合以上的论述，可见帝国主义的扩张并不是过去式，而是一种现在进行式的压迫行为，而反对帝国主义，提倡本土价值就是近代和现代亚洲国家民族主义发展的理论基础，本文试就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孙中山，以及世界知名的马来西亚民族主义者马哈迪对欧美帝国主义的理解作一诠释，并对其响应之道作一初步的比较探讨，以发掘亚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共通性和必然性，并从中检视民族主义运动的出路。

二、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理解

孙中山对中国最大的贡献，除了是鼓吹和领导终结二千年的中国帝制传统之外，就是在他身后留下了深受中国海峡两岸肯定的理论和主张，除了台湾“中华民国”的宪法和体制乃依据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而打造之外，^② 史家杨天石也认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民主革命事业的继承者。^③ 他之不朽，在于“他不但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与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划时代的思想家”，^④ 他“融

1978, pp. 145-185.

- ① 事实上，许多共产主义国家的革命胜利主要并不是立基于阶级斗争，而是民族主义，列宁巧妙地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结合在一起，使许多共产党菁英如毛泽东等因为胜利而无法看清阶级斗争为虚，民族斗争为实的本质，而导致许多无谓的阶级迫害，损失了大量的菁英人口，也降低了国家的生产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柬埔寨波布政权的大屠杀。于是乎，国外的资本主义帝国尚未自我毁灭，国内的共产党就以过激的阶级斗争来毁灭自己，凡此种种，实在是共产党革命的一大错误，这个错误也导致共产党国家在上个世纪末民生凋零，并纷纷灭亡。所幸中国在邓小平上台后，扬弃毛泽东时代强调阶级斗争的治国观，回归孙中山以民族为本的立国方针，方才得以重新壮大起来。
- ② 见《中华民国宪法》第1条“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
- ③ 杨天石：〈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前途 - 兼论清末民初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批评〉，杨天石，《孙中山与民初政局》，台北：风云时代，2009年，第45-73页。
- ④ 贺凌虚：《孙中山政治思想论集》，台北：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

合古今中外成果于一身，以高瞻远瞩、吞吐万象、富于创新的雄迈气势，创立理论，规划未来，以理论指导实践，将理论付诸实践，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只有孙一人能够做到，这也是他得以超越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伟大之处。”^① 因此可以说，“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孙中山可以称作是提出完备的开放思想与政策的第一人。”^②

纵观孙中山一生的革命历程，其革命的观点历经了大幅的更动，总的来说，依学者朱浚源、王晓波等的观察，孙中山立国思想之发展，是先由排他性强烈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汉民族主义”为起始，再因应时势，才逐步增修补述，在民国建立后始发展成为融合多元的国族主义，并最终演化成追求世界民族平等的“大亚洲主义”。^③

不可否认地，孙中山从1895年10月图谋在广州发动武装革命事败之后，就开始在世界各地积极诉诸汉人的民族情绪，宣扬排斥满族的汉人民族主义，以推翻满清政府，如1904年4月10日孙中山在旧金山的华人会党洪门的大会上，在其写下的新章程就提出“本爱国保种之心，立兴汉复仇之志”，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④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也以同样的口号作为同盟会的四大纲领，从此该“驱除鞑虏”的口号就传遍海内外，成为革命党人的共同誓言，使孙中山一跃而成为汉人民族主义者的领袖。

惟我们审思孙中山的主张，我们可以发现孙中山最早，也最一以贯之的政治要求，并非推翻满民族的民族革命，而是追求强盛中国，抵御外国侵略之道。对此，台湾学者庄政认为孙中山早期外交思想的本质和主流，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中国完全独

1995年，第1-2页。

① 曾纪鑫：〈孙中山：民国之父〉，曾纪鑫：《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台北：远流，2009年，第365-410页。

② 杨天石：〈孙中山思想的现代价值〉，杨天石：《孙中山与民初政局》，2009，第92-104页。

③ “狭隘的民族主义”一说来自朱浚源（1992），“汉民族主义”一说可见：王晓波编著：《孙中山思想研究》，台北：问津堂，第46页。

④ 孙中山：〈重订致公堂新章要义〉（1904年5月24日），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九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第239-249页。

立，而且是一以贯之的。^①

孙中山早年生长在广州，由于14岁至18岁（1879-1883）期间在夏威夷留学，生活在白人与夏威夷人排华的恶劣环境中，自然深切体会到种族与国家被欺凌的耻辱。^② 我们从孙中山1894年6月上李鸿章（1823-1901）书的内文中所看到的也是一个怀着满腔热血，准备报效满清朝廷的爱国青年，在书中他首次揭示资本主义帝国的成功之钥：“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③ 然而在李鸿章未能接见孙中山，复又在次年甲午战争败于日本而割让台湾之下，孙中山才对满清政府绝望，始发动暴力革命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国为志愿。

由此可见早年孙中山所追求的是拯救中国之法，而非排满之道。即使上书李鸿章未获回应后，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时，仍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申民志，扶国宗”为宗旨，^④ 自1895年2月18日他回香港组织兴中会，才有对朝廷和官府公开的猛烈批评，但所批评之焦点，乃是针对官府和朝廷的贪污腐败，纲维败坏，成立兴中会的宣言里有一段“庶我子子孙，免于奴隶于他族”，当中所谓的“他族”其实是指“久垂涎我中华五金

① 对此，庄政认为，中共领袖长期认为孙中山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基于此阶级成分的软弱性，在革命之初未尝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而且在他一生的大部份时间中，都存在着以为帝国主义国家会同情和援助中国革命的幻想，直到他的晚年，才彻底醒悟过来，这种说法，不符事实。见庄政：《孙文思想与政略》，台北：国立编译馆，2001年，第68-69页。

② 对此，孙中山曾提到，早年中国人坐船到美国，无论所坐的船位是哪一等，美国人都会来盘问是中国人或是日本人，如果是日本人，便可自由上岸，如果是中国人，便要入关检查，而且要麻烦好几日，而且旧金山的大旅馆，也不许中国人住。见孙中山：〈国民以人格救中国〉，1923年10月21日在广州青年联合会的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353-360页。

③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1894年），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四册，第9页。

④ 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1894年11月24日），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二册，第1-2页。

之富，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环列强邻”，而非国内统治族群之压迫。^①可见在未发动暴力革命之前，孙中山早就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所认识，在1895年底开始发动暴力革命后，他也时时不忘提醒世人帝国主义的危害，如1904年5月他就强调：“当今为竞争生存之时代，天下列强高唱帝国主义，莫不以开辟疆土为野心，五洲土地已尽为白种所并吞。今所存者，仅亚东之日本和清国而已。”^②

因此孙中山鼓吹推翻满清政府，表面上是号召汉族驱逐异族统治，实际上却是防止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如1907年孙中山在马来亚槟城对华侨的演讲中提到“中国已是处于极危险的地位，随时可以遭外国瓜分的惨祸”，满清政府对列强予取予求，成为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和日本的奴隶，而汉人又是满人的奴隶，就成为“奴隶中的奴隶”，因此，要使中国人和外国人平等，不做外国人的奴隶，首先就要推翻满清政府。^③在槟城的另一场演讲中，孙中山也认为“列强既鉴于满虏的积弱，与其惧外媚外的心理，为求进一步的施行侵略起见，于是更划定势力范围于各省，充其极必瓜分中国而后止”，因此要“驱逐满州的鞑虏，挽回已失的主权，建设独立的基础，才可救中国。”

我们深究孙中山早期排满的激烈言论，主要目的就是团结大多数的汉族以推翻满清政府，免除“亡国灭种”的威胁，^④因为“一种族与他种族之争，必有国力为之后援，乃能有济”，“我华人今日乃亡国之遗民，无国家之保护，到处受人苛待”，^⑤而满清政府把“祖宗留下来的土地送归外国的版图，把四万万炎黄裔胄，沦为他人的奴隶”，^⑥若不革命，“中国势必由满清之手，转而亡于外

① 孙中山：〈香港兴中会宣言〉（1895年2月18日），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二册，第2-5页。

② 孙中山：〈重订致公堂新章要义〉（190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九册，第239-249页。

③ 孙中山：〈欲救中国必先推倒满清〉，1907年槟榔屿平章会馆演说，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14-16页。

④ 同前注。

⑤ 孙中山：〈中国革命之难易〉，1910年2月28日在旧金山丽蝉戏院对华侨演讲大意，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18-19页。

⑥ 孙中山：〈满清不倒中国势必再亡〉，1908年槟榔屿小兰亭俱乐部演说，

人，到时亡国奴生活之惨痛，或更有十百倍于今日”。^① 因此，在孙中山的眼中，所谓的大清帝国，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在华代理人而已，必须要加以推翻之。

孙中山采取如此激烈的民族主义言论，实在是为合理化其暴力行径的不得不然。对此，西方学者 Daniel Chirot 和 Clark McCauley 分析，迫在眉睫的威胁论其实是强化族群团结最有效的手段，而且也容易为立场极端的领袖赢得更多的支持者，这一类的领导者能够动员人们追随，是藉强调威胁之严重，使之产生一种恐惧，而力量最大的恐惧，就是对灭亡的恐惧，恐怕“我们的人”，“我们的理念”，“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会无法存活，这种恐惧除了会巩固群众的认同之外，亦会引起最激烈最极端的反应，如果没有这种坚强的群体认同，个人会不甘愿为团体牺牲自己的性命。^②

而对于这个“驱除鞑虏”的口号，史学家唐德刚还是给予高度赞扬的，他认为这个口号主题鲜明，而且把大清帝国之内的一切罪恶，都派给鞑虏去承担，打击面缩小，抵抗力也减少。“这个口号，在那时真是既可服人之口，又可服人之心。人心之向背，便决定了大清帝国覆灭的命运。”^③ 于是乎，自孙中山提出排满的革命论后，海外侨社特别是马来亚新加坡一带掀起了一股革命的民族意识，革命派的影响力后来居上远远超过保皇派，^④ 两地的华侨也对孙中山所发动的最后几次革命中提供最大的人力和财力支持。学者华中兴认为，现实的急迫感使孙中山要寻求一种简化的救国之术，而最简化的方式即是以分化的手法推翻拥有多数汉人维持却由满人作皇帝的清朝。^⑤

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 16-18 页。

① 同前注。

② Daniel Chirot & Clark McCauley 著，薛绚译：《为什么不杀光：政治大屠杀的秘思》（*Why Not Kill Them All: The Logic and Prevention of Mass Political Murder*），台北：立绪，2007，第 95-99 页。

③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台北：远流，1998，第 134 页。

④ 此乃根据郑良树的观察。见郑良树：〈保皇党及革命党对新马华教的影响比较〉，张希哲与陈三井主编：《华侨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1997，第 63-81 页。

⑤ 华中兴：〈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本源初探：种族主义或国家民族主义〉，《思与言》，1992 年 30 卷第 2 期，第 39-90 页。

因此，一到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我们就不难发现身为总统的孙中山就立即扬弃旧说，开始积极主张汉、满、蒙、回、藏的民族统一，五族共和了，^①而此后，排满的主张不再出现于他的言论之中。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观点在建国前后改变如此迅速，甚至自我否定，就可证明在革命时期所宣传的排他、偏狭的汉族种族主义，并非孙中山真正的主张，因此，孙中山所提倡的革命思想，由始至终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一旦革命成功，孙中山就把民族主义的矛头对准帝国主义。

在1912年辞去了大总统的职位后至1924年逝世的这段期间，孙中山又历经了多次的政治波澜，他的三民主义学说，以及他对帝国主义的诠释，也发展的更为成熟与透彻。孙中山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可分成三个层面，其一为政治力的压迫，其二为经济力的压迫，其三为精神或价值上的压迫。

首先，孙中山看穿了“欧洲各国是主张侵略，有强权，无公理”的本质，^②主张帝国主义“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别国的主义”，世间的战争，主要就是帝国主义为侵占他国的资源所发动，^③然而，如果他国不能在政治上屈服弱国，就会对其施以经济上的压迫：“如果列强还再用政治力来征服中国，中国将来一定是要反抗，对于他们是很不利的；所以他们现在稍缓其政治力来征服我们，便改用经济力来压迫我们。”^④而这种经济上的压迫，依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三讲》中所言，至少有七种模式：

-
- ① 见“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民，是日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日领土之统一。”见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1912年1月1日），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十一册，第23-25页。
- ②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3-12页。
- ③ 见：“什么是帝国主义呢？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别国的主义，即中国所谓勤远略。这种侵略政策现在名为帝国主义。欧洲各民族都染了这种主义，所以常常发生战争，几乎每十年中必有一小战，每百年中必有一大战。”见孙中山：〈民族主义第四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29-37页。
- ④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三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22-29页。

1. 倾销商品：孙中山以西方大量纺织品进入中国销售而打垮中国纺织工业为例子，举出帝国主义经济上的压迫，首先就是大规模地倾销西方廉价的工业产品，使一国的民族经济完全倾覆。^①
2. 高额赋税：西方各国控制下高额的海关税务，使中国货物无法正常销售。
3. 外国的银行和汇兑：外国银行收取中国人的黄金等存款累积资本，又透过放款的方式，赚取中国人的利息，尤其甚者，更专门印刷大量纸钞，换取中国人的货物，“我们平常都以为外国人很有钱，不知道他们都是用纸钱来换我们的货物，他们本来没有许多钱，好像是我们送到他们的一样，”^②“外国银行一项，在中国所获之利，统合纸票、汇兑、存款三种算之，当在一万万元左右。”^③
4. 运输的费用：中国由于没有自营的国际运输公司，所有商品的出口都要仰赖外国海运，甚至在国内的运输也受外国公司所控制，中国产品的成本有很大一部份属于外国公司的运输。
5. 地租和地价：租界内的外国人任意买卖中国土地，中国人缴交给外国人的地税和租税，不计其数。
6. 独占的经济之权：中国境内外人之团体及个人营业，恃其条约之特权，来侵夺中国之利权。
7. 投机事业：“租界以内的外国人，每利用中国人贪婪的弱点，日日有小投机，数年有一次大投机，尽量激发中国人的赌性熟狂；如树胶的投机，马克的投机，每次结果，总是中国人受亏累，这种亏累，至少都有数千万元；而天天的小投机事业，积少成多，便不知道是有多少数目了。”^④

纵观以上帝国主义的各种经济压迫，没有一项是过时的，它们

①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三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22-29页。

② 同前注。

③ 同前注。

④ 同前注。

至今仍然是帝国主义国家或企业对开发中国家实施经济控制以至巧取豪夺的主要手段，足可见孙中山当年的真知灼见。孙中山主张这种经济的压迫，和政治的压迫是相辅相成的，即“他们的政治力帮助经济力，好比左手帮助右手一样，把多数的十二万万五千万人民，压迫得很利害。”^①

孙中山断言，经济力的压迫，比政治力更为可怕，因为“政治力的压迫，是有形的，是愚蠢的人也容易看见的，经济力的压迫是无形的，一般人都不容易看见。”^② 帝国主义“将中国做成他的商场，源源不绝的销售他的商品，一方面又将中国的土地出产及人民的劳力，来满足他们掠夺原料，榨取劳力的欲望。这样绝人生计灭人种族的政策，在美、非、澳诸洲都是百发百中的，不怕中国会逃到哪里去。”^③ “试看美洲的红番，从前到处皆有，现在便要全数灭亡。所以我们晓得政治的压迫是很利害，还要晓得经济的压迫是更利害。”^④

除此之外，孙中山认为，帝国主义对弱小国家所实施的，还有精神和价值上的压迫，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用宗教力来耗夺中国人的精神”，^⑤ “一班神甫牧师倚仗他们的国力，包庇教民，干兴词讼，欺压教外的人，无所不用其极”，而义和团事件，“也是帝国主义逼着他发生的。”^⑥ 至于帝国主义所灌输的白人至上的价值观，也影响了一整个世代的中国人，让中国人心理上产生了低人一等的心理，否定中国的一切，迷信外国的一切，即“中国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

①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四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29-37页。

②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二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22-29页。

③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为九七国耻纪念宣言〉（1924年9月7日），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二册，第163-167页。

④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二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22-29页。

⑤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为九七国耻纪念宣言〉（1924年9月27日），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2册，第163-167页。

⑥ 同前注。

比中国好。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只要听到说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这种行为，在孙中山而言，是一种重大的“流弊”。^① 由此可见，在当时西化风气高涨的时空下，孙中山仍然力主反对全盘西化，孙中山更因此而发展出一套结合欧美的西方和亚洲的东方观点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学说，以作为其反制帝国主义，强国富民之理论依据。

三、孙中山的亚洲观点——中国特色的强国之路

总的来说，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和政治重心，就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② 实践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可说是孙中山毕生所求的目标，^③ 亦是百年后当代学者仍称道孙中山，喻之为伟人的主要原因。这个为拯救中国，使中国现代化而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内容广博，提出虽已逾百余年，但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却仍然具有高度的实践性，足可作为国家发展的指导方针。

三民主义学说主张中国之强盛，必先强调民族团结的民族主义，再进而强调民主的民权主义到强调促进人民生活福祉的民生主义，来一一加以实践完成。^④ 依孙中山所言，三民主义核心思想就是分别促进民有、民治和民享，并以自由、平等和博爱为精神的救

①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五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99-112页。

② “余之革命主义内容，赅括言之，就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已。”见孙中山：〈中国革命史〉（1923），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二册，第354-363页。

③ “我希望各同志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目的。我虽死，亦可瞑目”，见孙中山：〈促成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谈话〉（1925年3月11日），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二册，第649页。

④ 孙中山说：“三民主义的道理，原来是一贯的。如果要考究他们发生的次序，世界各个都是由民族主义进而到民权主义，再由民权主义进而到民生主义。”见孙中山：〈三民主义造就新世界之工具〉，1921年12月7日在桂林军政学界76团体欢迎会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3册，第276-281页。

国主义。^① 简而言之，三民主义首先就是一个打不平的主义，为促进平等而生，即“民族主义是用来对外国人打不平的，民权主义是用来对本国人打不平的，而民生主义是用来对大富人打不平”。^② 因此三民主义虽是三个主义而成，它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主体，虽因时机的不同会有所偏重，但根本上非得整体地进行不可。^③ 学者贺凌虚认为三民主义可以用“平等和自由的主义”来概括之。^④

学者朱谌断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皆以民族主义为核心，为起点亦为最终目标。^⑤ 若深究孙中山的著述，他“把中国变成世界上顶富强的国家”，^⑥ “使中华民族与世界所有民族同立于自由平等之地”^⑦ 等作为其革命之目标，可见孙中山一生之志业，乃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如孙中山所言：

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其在实业界，苟无民族主义，则列强之经济压迫，自国生产永无发展之可能。其在劳动界，苟无民族主义，则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及国内外之资本家，足以蚀其生命而有余。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

-
- ① 见下列两段话：“吾党之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三种。此三种主义之内容，亦可谓之民有、民治、民享，以自由、平等、博爱无异。”“什么是三民主义？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上文可分别见孙中山：〈党员须宣传革命主义〉，1921年11月梧州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269-272页；〈民族主义第一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3-12页。
- ② 孙中山：〈革命军不可想升官发财〉，1924年3月10日在广州对东路讨陈军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269-272页。
- ③ 贺凌虚：《孙中山政治思想论集》，第6页。
- ④ 贺凌虚：《孙中山政治思想论集》，第7页。
- ⑤ 朱谌：〈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三民主义学报》，第15期，1992年，第25-62页。
- ⑥ 孙中山：〈国民党之奋斗之法宜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1923年12月30日广州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392-400页。
- ⑦ 孙中山：〈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致党员通告〉（1924年3月2日），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二册，第140-142页。

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①

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精神，就没有孙中山的建国运动，更没有继之而生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观不但催生了一个全新的中国民主体制，还影响了整个中国民族之发展方向。这个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是一套结合中国传统和西方学说，符合中国社会特色的治国方针。如同孙中山所言：“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②如果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③他又说：

“欧美的物质文明，我们可以完全仿效，可以盲从，搬进中国来也可以行得通。至于欧美的政治道理至今还没有想通，一切办法在根本上还没有解决，^④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便要重新想出一个方法”^⑤；

“如果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大害的。因为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⑥

如此，若不能全盘西化，则所谓的中国特色的治国观，反制帝

①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0日），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二册，第131-140页。

②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五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99-112页。

③ 同前注。

④ 同前注。

⑤ 同前注。

⑥ 同前注。

国主义的方法，又是如何实施？

首先，在民族主义方面，孙中山主张**以积极的行动将国家各民族来加以整合成一个国族——即中华民族**，其具体的作法有四，其一为恢复中国的固有道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其二为恢复中国固有的智能，掌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智识”，回复中国曾经领先全球的科技水平，^①其三为透过实施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使各民族在政治和经济权利上都平等，^②其四为让少数民族和平同化于汉族。

在孙中山而言，将国民整合成单一国族，依其实施的阶段来陈列，乃有以下不得不然的原由：强调国族主义的第一阶段，就是要团结国人以挽救国家于危亡。孙中山认为，“民族就是国族”，^③

“如果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要挽救中国的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以防止实行帝国主义的列强瓜分灭亡中国。”^④

再说，孙中山的国族整合，并非就是要压制或消灭少数族群的文化，首先，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本来就是强调“扶倾济弱”和“民族平等”，他一贯反对民族的压制，即“这种民族压制那种民族，压制愈利害，反动也愈利害。”^⑤更何况，“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二族所独占。”^⑥

实行国族主义的第二阶段，**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平等**，“使中华民族与世界所有民族同立于自由平等之地。”^⑦对于平等，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就是要中国和外国特别是英美等强盛国家趋于平

①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六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45-54页。

②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本政纲〉，1921年2月1日在国民党粤省支部成立大会演说，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223页。

③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第3-12页。

④ 同前注。

⑤ 孙中山：〈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1921年12月7日在桂林军政学界76团体欢迎会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276-281页。

⑥ 孙中山：〈党员须宣传革命主义〉，1921年11月在梧州对中国国民党员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271页。

⑦ 孙中山：〈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致党员通告〉，第141-142页。

等的主义，^① 具体的作法，“就是振作国民精神，同心协力，争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废除不平等条约，否则中国就不是世界上的国家，中国人也不是世界上的国民”；^② 而对于自由，孙中山认为其时中国的地位如同次殖民地，要做各国的奴隶，比缅甸、安南、高丽等殖民地都不如，中国人就要成为一个很坚固的团体，使国家能够行动自由，如此中国便是个强盛的国家，中国民族才有真自由。^③

实行国族主义的第三阶段，**就是反对以帝国主义为中心，似是而非的全球化理论**，并锄强扶弱，为世界弱小民族打不平，促进世界民族之平等。对此，孙中山早就看穿帝国主义所鼓吹的“世界主义”，^④ 反映的是帝国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对全球的统治霸权，是一种强权主持的统治秩序：“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要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⑤ “我们要知道世界主义是从什么地方发生出来的呢？是从民族主义发生出来的。”“欧洲人所谈的世界主义，是强权无公理的主义。”^⑥ 而“列强以世界主义来煽惑我们，说世界的文明要进步，人类的眼光要远大，民族主义过于狭隘，太不适宜，所以应该提倡世界主义。近日中国的新青年，主张新文化，反对民族主义，就是被这种道理所诱惑。但是这种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该讲的，我们是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来讲世界主义。”

因此，“中国先把失去了的民族主义恢复起来，用四万万人的

① 孙中山：〈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1924年4月24日广东女子师范学校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452-461页。

② 孙中山：〈中国内乱之因〉，1924年11月25日神户东方酒店对日本地区中国国民党欢迎会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527-535页。

③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67-76页。

④ 当时并没有“全球化”这个词汇，世人多以“世界主义”来称之，“全球化”是二次大战后才兴起的新词汇。

⑤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三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22-29页。

⑥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四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29-37页。

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① “自己先联合起来，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联合起来，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强权。”^② 同时，孙中山也认为“济弱扶倾，才是中国人的天职，对于弱小的民族要扶持，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才算是治国、平天下。”^③ 到了这个阶段孙中山对民族主义作了更进一步的诠释：“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族平等，一种族绝不能为他种族所压制。”^④ 这个原则一经发表，就成为孙中山至死不渝的强烈信仰，^⑤ 而后孙中山所提出的大亚洲主义本质上也是秉持这个精神而生。这个大亚洲主义，乃是号召亚洲人民以日本和中国为首加以联合起来，争取亚洲全部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压迫。^⑥

在民权主义方面，孙中山把民主解读为“人民管理政事的权力”，^⑦ 但提倡民权，“不可能完全仿效欧美，”必须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民国初年中国仿效欧美的代议政体，“它的好处，中国一点都没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百十倍。”^⑧ 对此，孙中山认为民主不是只有选举权，只有选举权的民主是不够的，他主张人民除了选举权之外，也应有创制权，即推动立法之权；罢免权，即罢免不适任的官吏之权；以及复决权，即推动旧法律的废止或修改。这四

①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四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29-37页。

②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二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22-29页。

③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六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45-54页。

④ 孙中山：〈欲改造新国家当实行三民主义〉，1922年1月4日桂林广东同乡会欢迎会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306-308页。

⑤ 他晚年在国事如麻时还抽空发表文告呼吁世界弱小民族形成反帝国主义的阵线，足可见他对解放世界弱小民族的重视。见孙中山，〈呼吁世界弱小民族形成反帝联合阵线〉，1924年1月6日，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二册，第130-131页。

⑥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1924年11月28日神户高等女校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535-542页。

⑦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55-66页。

⑧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五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95-112页。

权（按：即选举、创制、复决和罢免）合而为一，就是直接民权，亦为人民的四权。而政府的统治权，也必须分为五权，其中把本应属国会立法权力的监察权分离出来独立成一权，以防止国会因为党争而任意弹劾行政官员的乱象，把本应属行政权力的考试权（按：即官员选拔权）分离出来独立成一权，以防止行政权任人为亲，朋比为奸的乱象，如此成为一个拥有五权——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和监察权的政府体制，而当中的考试权和监察权，就是“中国固有的东西”，^①其中监察权就是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考试权就是科举制度。目前台湾所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以这五权架构来组织政府的宪法，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结合中国传统和西方民主制度之政府组织法，它在台湾实行六十多年来，并无任何重大的阻扰，作为台湾政治稳定主要凭借，孙中山的治国观点，仍超越时代而生生不息。

虽然如此，由于中国人民普遍缺乏对民主的认识，孙中山当年也不主张冒然的民主化，五权宪法要在中国民主化的条件成熟之后，才能完整地实施，因此孙中山的民主观点，必须要依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渐次地发展，决非一步登天。所谓军政，就是用武力维系的极权统治时期，“以扫除国内的障碍，”^②训政就是训练人民了解民主，有限地应用民主权力的威权时期，如开放地方乡、县的自治权等，待时机成熟，最后才是完全实行民主的宪政时期。^③事实上今天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也是完全跟随孙中山所规划的民主化三个阶段来进行的。目前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渐次开放农村的选举，也有依循孙中山民主化途径的味道。

最后谈到民生主义，孙中山指它就是“发展人民的生活”，事实上也就是发展社会和经济，增进人民生活福祉的主义，对于这个主义，孙中山的定义较为笼统含糊，说它是社会主义，又是共产主义，事实上它是一套结合包括资本主义在内，各个主义的国家发展方针，其中最主要的发展方针是：一、节制私人资本，压制富商的财富累积，以降低贫富差距，二、发达国家资本，建立大型的国营

①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六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113-118页。

② 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1924年4月12日），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623-625页。

③ 同前注。

企业以发展可以和外国资本家竞争的主要工业，其收入平均回馈给国民；三、平均地权，即在农村者，让耕者有其田，农民人人都是小地主，^① 在都市者，透过土地部份上涨的价格归国家公有的方式，压制土地的炒作，解决房屋问题，^② 四、开放外资投资中国，借用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改善中国经济。对此，孙中山在其巨著《实业计划》中就主张“中国富源之发展，已成为今日世界人类之至大问题，不独为中国之利害而已也。”^③ 因此，孙中山乃邀请各国投资中国的建设，即“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利用此绝无仅有的机会以谋求世界之和平实现也。”^④ 然而，这个发展不是出让中国的经济：“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⑤

当代西方学者 Marie-Cleire Bergere 指出，孙中山当年所要求的国际共同合作开发发展中国的政策，正是今天联合国组织经常实行的做法，足可见孙之远见，非当时同时代中国人所能及。^⑥ 孙中山相信，反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是实行一套结合中国哲学和西方思想，加以独创而成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它是一个可以发展中国，让中国各方面都和列强平起平坐的指导哲学，^⑦ 作为中国第一任平民总统，孙中山为中国立下了一个独特的治国理论，其观点仍然可以精确地描绘当代的时局，作为近现代一位亚洲治国观的开创者，孙中山可说当之无愧。

① 孙中山：〈耕者要有其田〉，1924年8月21日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495-498页。

② 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二讲〉（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145-157页。

③ 孙中山：〈实业计划〉（1924），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一册，第423-549页。

④ 同前注。

⑤ 同前注。

⑥ Marie-Cleire Bergere（白吉尔）著，温洽益译：《孙逸仙》（Sun Yat-Sen），台北：时报，2010，第321页。

⑦ 孙中山：〈同胞要实行三民主义〉，1924年5月30日应上海中国晚报之邀播音于广州之留声机片断，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三册，第469-471页。

四、马哈迪对帝国主义的理解

马哈迪和孙中山的一大不同之处，在于他拥有比孙中山更长的掌权时间（1981-2003），并在他的治理期间打造了一个首相权独大的威权体制，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把他的治国理念贯彻到全国。^① 如同 Zainuddin 所言，“马哈迪 1980 末一连串个人的政治胜利，已经让他可以近乎毫无阻碍的情况下实行他的愿景和计划，每一件事情都如其所愿地进行着，只有逐渐老化的年龄迫使他加快国家现代化的步伐。”^② 他这种个人化的统治风格，不仅是因为他是位“孜孜不倦的民族主义者”，^③ 相较前三任首相，专栏作家出身的他拥有塑造个人风格的论述能力，他一方面即能凑合论辩、理念与政策，拟出一套富有说服力的国家宏愿，另一方面又能在其任内建构出一套符合巫统政党利益，结合马来族群主义的伊斯兰化观点以作为巫统的统治基础。作为一个民粹的领袖，他也擅长利用巡回全国的演说来激励人心，这些面对群众的演说就成为其在政治危机时巩固权力的利器。^④

除了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相同的，压制异议的威权统治手段之外，马哈迪拥有其他两个较为为世人所熟知的特质，其一为在国际上敢怒敢言，为弱小国家打抱不平，敢于批评西方国家和白人族群主

① 对此，庄迪澎提到，“在马来西亚，一些悬而未决的政治议题或管理积弊，大至经济政策，小至吉隆坡垃圾问题，往往在马哈迪表态后，都有了行事方针，各部会首长就按首相的指示办事。”庄迪澎：《给马哈迪的媒体操控算账：强势首相对弱势媒体》，吉隆坡：破媒体传播事业社，2004，第 5 页。

② Zainuddin Maidin, Wan A. Hulaimi Trans. *The Other Side of Mahathir*. Kuala Lumpur: Utusan Publications & Distributors Sdn. Bhd, 1994, p. 148.

③ Cheah Boon Kheng, *Malay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SEAS). 2002, p. 389.

④ 根据邱武德的整理，马哈迪喜欢直接面对群众，每每在全国选举之前就会来一场巡回全国各州城市的演说，惟在 1983 年以及 1991 年和王室冲突时期，以及 1987 年巫统党内分裂的时期他也发动了类似的演说。每一场演说都有电视现场直播。见 Khoo Boo Teik, *Paradoxes of Mahathism*.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esity Press, 1995, pp. 198-202, 208.

义的言行，此举使他在 1990 年代一跃而成为国际知名的领袖，^① 俨然是亚非发展中国家，“亚洲价值观”的代言人，^② 或“亚洲的巨人”。^③ 其二是就是强调伊斯兰的治国哲学。

以研究马哈迪而知名的邱武德（Khou Boo Teik）教授认为马哈迪思想（Mahathirism）可分为五个中心部份，即：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伊斯兰、平民主义和威权主义（nationalism, capitalism, Islam, populism and authoritarianism）；^④ Milne 和 Mauzy 则视马哈迪为积极的现代化推动者（An eager and dedicated modernizer）；他个人的构想往往就会成为国家的重大发展计划，^⑤ 他不隐藏他本身坚定的信念，并致力于透过无数的演讲和政策的落实来宣扬之。张景云亦形容马哈迪身上揉合了三个政治角色，第一个是马来民族主义者，第二个是现代化的策动者，最后就是务实派政客。^⑥ 惟邱武德将马哈迪形容为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者，皆因其把族群的关系比拟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关系。^⑦

事实上，贯穿马哈迪思想的，仍然是其念兹在兹的马来民族主义，这个民族主义对内，就是追求马来霸权的领导，对外，就是反西方的帝国主义，前者固然为他带来种族主义的恶名，而后者，却为他赢得了众多国际友人的称誉，后者的光芒也往往成功掩饰了前者的不足。纵观马哈迪诸多丰富的言论和著述，马哈迪认为，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可分成以下几个层面：

-
- ① Barry Wain, *Malaysian Maverick: Mahathir Mohamad in Turbulent Tim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257.
- ② Tom Plate, *Conversation with Mahathir Mohamad: Doctor M: Operation Malaysia*,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2011, p. 17.
- ③ *Ibid.*, p. 91.
- ④ Khoo Boo Teik, *Paradoxes of Mahathirism*. p. 7.
- ⑤ R.S. Milne & Diane K. Mauzy, *Malaysian Politics under Mahathi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6.
- ⑥ 张景云：〈华团与政治：解去政治化的前景〉，何启良编著：《当代大华人政治省思》，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4，第 102 页。
- ⑦ 如在其早期的著作《马来人的困境》一书中，马哈迪承认在人种上马来人的竞争力、教育程度、智慧皆远比华人逊色，即相对于华人，马来人在马来西亚是属于弱势族群。因此，马来人需要被保护和被赋予持权，并藉此以提高其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平，这样族群间才能“平等”，两大族群才能整合起来。

其一，好战的帝国主义利用武力来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马哈迪认为亚洲人向来均尊重贸易伙伴，奉行和平贸易的传统。帝国主义为了垄断市场，却把他的贸易伙伴加以占领，因此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伴随贸易而来，对西方而言，“哪里有贸易，哪里就有帝国主义。”^① 对马哈迪而言，这个西方帝国主义的最主要代表，就是美国。在他的眼里，美国完全不理睬世界其他国家的感受，一味地推行他的议程，或是用军事力量来威吓他国，寻求支配世界。^② 因此，美国所代表的，就是“旧欧洲帝国主义的改头换面”。^③ 尤其甚者，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也十分好战，他们花费巨额的金钱只为了发展日新月异的尖端杀人武器，这些武器足以毁灭人类无数次，^④ 而因为他们的好战，“有数十万的人被屠杀，许多部族被灭绝，”他们又任意重划领土，任意将不同的族群聚集在一起，让许多脱离殖民的国家陷入内战的乱局，使他们一直保持借口干预这些国家的内政。^⑤ 马哈迪认为，这些战争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如美国侵略伊拉克就是一个失败的反恐战争，因为这场战争事实上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它不但激起穆斯林的愤恨，而且更助长了恐怖活动。因此相信军事至上和文明的冲突，是一种错误，对世界的和平无所帮助。^⑥

其二，西方利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来建构统治秩序：对此，马哈迪不讳言人类都生活在欧洲中心的世界（Eurocentric World），全世界都有欧洲主宰的痕迹，甚至欧洲的思想也影响了全球人类，^⑦ 是以，马哈迪认为西方所鼓吹的全球化就是西方大企业独占

① Mahathir Mohamad, *A Doctor in the House: The Memoirs of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Kuala Lumpur: MPH Group Publishing Sdn. Bhd., 2011, p. 395.

② *Ibid.*, pp. 434-435.

③ 见原文：“It is the same old European imperialism manifesting itself in a new form”。见 *Ibid.*, p. 399.

④ *Ibid.*, p. 400.

⑤ *Ibid.*, pp. 396-397.

⑥ *Ibid.*, pp. 738-739.

⑦ 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马哈迪主张所谓的欧洲人是指“白种人”，其中也包括了美国人和澳洲人等，因此，他认为欧洲文明也包括了当代美国和澳洲等国家白种人的文明。见 *Ibid.*, pp. 389-390.

全球经济的过程，^① 西方过去先剥削东方国家的资源，再利用他们廉价劳动力来大力发展经济，^② 现在在壮大之后却又主张自由贸易来制约东方，而西方所主张自由贸易，如同大人和小孩在同一个球场上竞技，是一种西方合理化不公平竞争的借口，^③ 而西方一边鼓吹自由贸易，一边却又反对人民的自由迁移，更是一种双重标准。^④

其三，就是指西方白人至上的生活价值对亚洲国家的入侵：对此，马哈迪认为长期的白人殖民统治使马来人以至马来西亚人多产生了一种“自卑情结”（inferior complex），^⑤ 马来西亚各阶层人民都有盲目仿效欧洲人的倾向，^⑥ 惟从他们限制非白人移民的事证来看，马哈迪认为欧洲人事实上就是种族主义者（racialist），因此没有资格批评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⑦ 尤其甚者，欧洲的白人不单用种族主义来界定文明的优劣，还把他们的价值和制度强加在别人的身上。^⑧

依马哈迪之见，这些西方所强加在亚洲人身上的价值，可分成下列几项：其一就是当成他们信仰的自由主义和所谓的人权。^⑨ 对此，马哈迪表明每个民族都有他的价值，强加外来的价值在他们的身上是错误的。^⑩ 西方要求所有人都遵循他们的民主制度，“许多

① Mahathir Mohamad, *Reflections of A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 2002, p. 89.

② Mahathir Mohamad, *The Malaysian System of Government*. Kuala Lumpur: Prime Minister's Office, 1995, pp. 40-41.

③ Mahathir Mohamad, *Reflections of Asia*, p. 98.

④ Ibid., p. 10.

⑤ Mahathir Mohamad, *A Doctor in the House*, p. 648.

⑥ 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马哈迪主张所谓的欧洲人是指白种人，其中也包括了美国人和澳洲人等。见 Ibid., p. 385.

⑦ 原文：“The European in particular should have a closer look to themselves. They are all racialist, if not racist.” 见：Mahathir Mohamad, *The Malaysian System of Government*, p. 36.

⑧ Mahathir Mohamad, *The Way Forward*,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8, p. 129.

⑨ Mahathir Mohamad, *The Malaysian System of Government*, p. 72.

⑩ Tom Plate, *Conversation with Mahathir Mohamad*, p. 81.

反对者因此而被加以杀害”，^① 这种行为反而伤害了他们最基本的人权。其次，是环保的理念，马哈迪认为北方国家是破坏地球环境的元凶，却还发动抵制开发中国家的伐木活动，此举就是否定他们利用自己的财富脱离贫困、饥饿和疾病的权利，当他们否定开发中国家发展经济的自由，他们又有什么资格来谈自由？而这种价值上的压迫，就是帝国主义。^② 最后，西方也对亚洲传播了如自由性爱、裸露、同性恋、破坏公共财物的生活价值，这些败坏的道德都是西方所包容甚至鼓吹的行为，但对亚洲人如马来西亚人而言，这些行为都是对自由的滥用，是属于西方而非东方的价值，^③ 政府应该照顾人民的道德，拒绝这些败德的行为。^④

五、马哈迪的亚洲观点——马来伊斯兰的强国之路

和孙中山一样，马哈迪也有自己一套以“亚洲价值”为基础，结合西方思想的治国观点。这些观点大致而言可分成以下几项：

其一，为奉行“亚洲特色”的民主制度。马哈迪主张，世间并没有极端的自由，绝对的自由会带来社会失序（social anarchy），^⑤

“自由必须要依环境和时代的变迁来作调整，故最好的社会模式是社会责任制（social responsibility model）”。^⑥ 是以，“马来西亚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是不同的。”“民主不是宗教，我们必须检视我们的民主，人民和国家的福祉比民主更为重要，民主是为国家和人民而生，而不是为民主而生，如果民主的内容会伤害国家福

① Mahathir Mohamad, *A Doctor in the House*, p. 393.

② Mahathir Mohamad, “Official opening of the Second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Kuala Lumpur, April 26, 1992, in Govin Alagasari ed. *Mahathir: The Awakening*, Sabah: Uni-Strength Sdn. Bhd. 1994, p. 379.

③ Mahathir Mohamad, *The Malaysian System of Government*, p. 77.

④ 对此，Mahathir 说“如果同性恋过于泛滥，会降低出生率”。见 Mahathir Mohamad, *The Malaysian System of Government*, pp. 81, 92-93.

⑤ Mahathir Mohamad, *The Malaysian System of Government*, p. 87.

⑥ Mahathir Mohamad, “World Press Convention”, Kuala Lumpur, September 18, 1985, in Govin Alagasari ed. *Mahathir: The Awakening*, p. 379.

祉，我们就必须以国家和人民的福祉为优先。”^① 而“马来西亚不止将大众的福祉置于个人的自由之上，也相信家庭、婚姻和保守的道德价值。”^② “因为绝对的权力会带来绝对的腐化，有权力的人民也会腐化”，因此人民的权力必须要受限制，^③ 政府有责任保护大多数的人民，^④ 因此西方诠释的人权观是东方所不能接受的。^⑤

尽管如此，马哈迪认可“人民有权利批评政府”，“如果马来西亚的政府不受人民欢迎，人民就可以在选举的过程推翻它。”所以和“许多开发中国家比较起来，马来西亚是政治自由的。”^⑥ 在最近的一场访问中，马哈迪甚至更辩称，因为人民可以自由选择让领袖下台，所以马来西亚不是威权体制，而过去他任内所犯下的，恶名昭彰的1987年大逮捕事件，是警方自主决定的作为，而非他的主张。^⑦ 显而易见地，马哈迪认为民主就是选举，其他都是次要，难怪马哈迪仍然辩称马来西亚的体制是民主的，“因为民主制度里头最大的自由，就是让人民有权利选择政府”，^⑧ 由此可见，马哈迪所谓的民主价值，是一种结合亚洲传统家父长式和西方民主选举的制度，然而倘若人民面临选举制度不公的威胁时，又该当如何？这大概不是马哈迪所考虑的范围了。

马哈迪另一套从“亚洲价值”出发的治国观点，就是实践性的马来伊斯兰观点。首先，作为一位非宗教教育出身的族群领袖，马哈迪从不讳言其对伊斯兰并无深入的了解，^⑨ 但却从不否认其作为

① Mahathir Mohamad, “Demokrasi dan Masa Depan Negara”, Ucapan di Perhimpunan Agung UMNO ke-50, 11 Mei 1996, in, Wan Mohd. & Hj. Nik Mustaffa (ed.), *Amanat Presiden* (主席的训词), Kuala Lumpur: Fajar Bakti, 1997, pp. 620-640.

② Mahathir Mohamad, *The Malaysian System of Government*, p. 78.

③ Mahathir Mohamad, “Jangan Lupa Daratan”, Ucapan di Perhimpunan Agung UMNO, 26 November 1995, in, Wan Mohd. Mahyiddin & Hj. Nik Mustaffa Yussof (ed.), *Amanat Presiden* (主席的训词), pp. 598-619.

④ Mahathir Mohamad, *The Malaysian System of Government*, p. 76.

⑤ Ibid., p. 74.

⑥ Ibid., p. 93.

⑦ Tom Plate, *Conversation with Mahathir Mohamad*, pp. 119, 182-183.

⑧ Ibid., p. 91.

⑨ 原文：“I do not claim to be an expert or an ‘Ulama’, an Islamic scholar, but it would be fatal for me to say that I am not qualified.”，见：Mahathir Mohamad.

穆斯林领袖的地位以及其对伊斯兰的虔诚信仰；^① 是以他的伊斯兰化理念与其说是他对伊斯兰认识的体会，不如说是作为一个马来穆斯林领袖而衍生的崇高使命与责任。他认为促进穆斯林地位的跃进和促进伊斯兰地位的提升是相辅相成；因此促进穆斯林现世的成就是为马哈迪伊斯兰化政策最主要的导向。在他刻意培育下，马来民族最重要的图腾——伊斯兰的影响力在其执政期间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

众所周知，马来西亚在马哈迪在位期间（1981-2003），史无前例地大幅实施了一系列伊斯兰化的国家政策，以致许多学者皆认为马哈迪担任首相期间就标志着马来西亚官方朝向伊斯兰化转变的年代，^② 而这个年代也被 Seyyed Vali Reza Nasr（2001）定义为马来西亚“伊斯兰化的时期（Islamization period）”。^③ 大体而言，马哈迪上台的第一个十年（1981-1990）就实施了许多突破性的伊斯兰化政策，亦大幅提升了伊斯兰的法律地位：较为显著的有如 1983 年设立国际伊斯兰大学（International Islamic University, IIU），伊斯兰保险公司（Syarikat Takaful Islam）和伊斯兰银行（Bank Islam Berhad, Islamic Bank），1984 年提出“在国家行政上

“Speech at the Oxford Centre for Islamic Studies, Oxford, U.K., 16 April, 1996”, in Mahathir Mohamad, *Islam: Misunderstood Religion*, Kuala Lumpur: Afro-Arab Centre, 1996, p. 1.

① 原文：“I hold very strongly to my religion.....”，见：Mahathir Mohamad, “Toleration and Moderation in Islam: Speech at the Al-Azhar University”, Cairo, Egypt, October 5, 1998, in Hashim Makaruddin ed. *Islam and the Muslim Ummah: Selected speeches of Mahathir*, Kuala Lumpur: Pelanduk Publication, 2000, pp. 105-116.

② 持此观点的学者不计其数，这里只列出几本主要参考著作：Tham Seong Chee. *Malays and Modernization: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265-268; Gordon P. Means *Malaysian Politics: The Second Gener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99-103; Hussin Mutalib. *Islam and Malay Ethnicity in Malay Politic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27-151; Norhashimah Mohd. Yasin. *Islamization / Malaynisation - A Study on the Role of Islamic Law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laysia 1969-1993*, Kuala Lumpur: A.S. Noordeen, 1996, pp. 197-202; Shanti Nair, *Islam in Malaysia Foreign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1997, p. 10.

③ Seyyed Vali Reza Nasr, *Islamic Leviathan: Islam and the Making of State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05.

吸纳伊斯兰价值政策（*Dasar penerapan nilai-nilai Islam*）”的国家政策（*Dasar Negara*），^① 1988年策动修订宪法第121之1(A)条文赋予伊斯兰法院独立裁判权，1988年宣布除伊斯兰节目外其余宗教节目均不得在电视和广播媒体播出等。^② 到了1990年代末期，马哈迪执政时期的伊斯兰化政策已经为他本人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鲜明的形象，凡此种种，皆深刻地影响了马来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也广泛地改变了马来西亚的社会面貌。这种结合成东方伊斯兰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为马哈迪赢得国际尤其是中东国家的赞赏。

在外交上，马哈迪又采取亲穆斯林国家的立场，如大量供应军火给波士尼亚的穆斯林反抗军，支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不管美国的抗议而和利比亚、苏丹、伊朗、伊拉克等国维系良好经贸合作关系，^③ 凡此种种，作为一种挑战美国帝国主义的姿态，让马哈迪成功争取到众多穆斯林国家的认同。对此，Sibamurugan Pandian认为马哈迪的伊斯兰观点乃是依据他个人的诠释与理解，而非依照传统伊斯兰学者的诠释。虽然如此，马哈迪的伊斯兰化观点和他所提倡的伊斯兰化政策仍获得许多国际著名伊斯兰学者如埃及艾兹阿哈（*Al-Azhar*）大学前校长 Mohammad Sayed Tantawi 教授的背书，使马哈迪成为当代国际最知名的伊斯兰国家领袖。^④

① 1993年两位大专学者出版一部专书介绍马来西亚独立以来14项重大的国家政策，其中有6项重大政策是马哈迪执政时代的代表性政策，即“7千万人口政策”、“向东学习政策”、“公务员以身作则”政策、“私营化政策”、“2020年先进国宏愿政策”以及“在国家行政上吸纳伊斯兰价值政策”。见 Yusof Ismail & Khayati Ibrahim eds. *Dasar-dasar Kerajaan Malaysia: Tinjauan Menyeluruh*（马来西亚政府政策：一个全面的观察）。Kuala Lumpur: A. S. Noordeen. 1993.

② 以上所列举的伊斯兰化政策，前三项经常被视为马哈迪政府伊斯兰化政策的标志（landmark）。见 Kamarulnizam Abdullah. *The Politics of Islam in Contemporary Malaysia*. Bangi: 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2003, p. 182.

③ Barry Wain, *Malaysian Maverick*, pp. 258-259.

④ Tantawi 教授也是前埃及穆夫提（按：即伊斯兰大法官），是埃及最高权威的伊斯兰法官，他曾多次前来马来西亚。最近一次是2008年2月16日前来为世界艾兹阿哈大学校友大会揭幕，并获颁马来西亚理科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他每次前来都对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政策大为赞许。当然也不吝于宣布马来西亚是“模范的伊斯兰国。”2008年1月17日他在艾兹阿哈大学校友会中说“因为马来西亚成功地让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和平相处，马来西亚不止是伊斯兰国，而是光荣的伊斯兰国（glorious Islamic

最后，马哈迪另一个积极展现其“亚洲观点”的场域就是经济领域。它在国内的实践上，主要就是发达以马来人为优先的民族资本，发展大型工业，以及鼓吹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国外，就是提倡向东学习，积极谋求亚洲一体的区域合作。对马哈迪而言，要解决马来人和马来西亚人的“自卑情结”，首先就必须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方法之一为扶持、保护马来人的经济，然后再保护马来西亚企业，使它能和国际竞争，方法之二为建设大型工程，让世人对马来西亚刮目相看；如对于马哈迪所自豪的国家石油双峰塔（Petronas Twin Towers）的落成，马哈迪辩称，如果一个人是矮子，他就需要一个肥皂箱以便让人看得见，听得到，而国家石油双峰塔就是马来西亚的肥皂箱，同理也可证明在全亚洲最大的中央政府行政中心布城（Putrajaya），国际水平的F1赛车场的承建，在各地兴筑巨型的清真寺等的建设上。

在扶助马来人的经济方面，马哈迪1983年所推行的国营企业私营化政策，更进一步塑造了大批的马来巨富。^① 巫统也在1972年10月2日设立了一个党营事业——舰队集团（Fleet Holding），此集团通过对各种工程的垄断在1980年代发展成国内主要的财团。^② 除此之外，马哈迪也不忘记全力发展国营企业，当中最成功

country)”。相关资料见 Sivamurugan Pandian, *Legasi Mahathir* (马哈迪的遗绪)。Kuala Lumpur: Utusan Publications & Distributors Sdn. Bhd., 2005, pp. 178-179; “Tantawi: Malaysia is a Model”, Bernama (马新社), January, 17, 2008, <http://www.bernama.com.my/bernama/v3/news.php?id=314375>, 2008年3月4日。

- ① 以上来自马哈迪的演讲，他进一步说：“现在即使发生族群暴动，被烧的奔驰劳斯莱斯汽车有可能是马来人本身的”，依他的逻辑，新经济政策透过提升马来人的财富保障了社会的稳定。见 Mahathir Mohamad, “Hapuskan Politik Wang (消灭金钱政治), Ucapan di Perhimpunan Agung Khas UMNO (巫统特别代表大会演讲)”, Jun 19, 1994, in, Wan Mohd. Mahyiddin & Hj. Nik Mustaffa Yussof (eds), *Amanat Presiden* (主席的训词)。pp. 567-577. 1994.
- ② 其旗下独占南北大道经营权的马友乃德公司（United Engineers Malaysia Bhd.）承揽了全西马来西亚绝大部份高速公路的工程，全马来西亚高速公路用户至今仍然每天要在全国三百个以上的收费站缴交过路费于该公司，这个庞大的过路费成为巫统重大的收入。见 Edmund Terence Gomez, “Capital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in, Jahara Yahaya, Tey Nai Peng, Yeoh Kok Kheng (eds). *Sustaining Growth, Enhancing Distribution: The NEP and NDP Revisited.*, Kuala Lumpur: Centr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thnic

的当属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作为马来西亚最大型企业，国家石油公司多次扮演救助马来企业的角色。在马哈迪的努力下，马来西亚产生了一大批的马来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① 马哈迪始终认为，如果马来西亚没有实施这些偏袒马来人的，正面的歧视政策（positive discrimination），华人就会主宰所有的一切，如此反而破坏了国家的民族团结。^②

马哈迪对外最著名的经济政策，就是向东学习政策和以亚洲为主体的区域经济整合政策，所谓的向东学习，就是以日本为首的亚洲先进国家为师的政策，简单来说，其最初就是指“学习日本的工作伦理和企业文化”，^③ 后来再扩张到经济上也较为成功的南韩和台湾。对此，马哈迪对日本产品的高质量和其强调工作效率、勤奋敬业、高度纪律、高度忠诚的工作伦理尤其称许，他自称曾经到过日本考察超过 50 次，每一次皆受到启发。有鉴于日本同样是来自于东方文化，“马来西亚人学习日本会比仿效西方的道德与文化更为容易”^④。同样地，日本和南韩资本主义的成功，也在于国家计划性地支持大企业，扶持大财团的策略，马哈迪也仿效此种方式，在 1980 年代打造了数个大规模的本土企业，并引进日本技术指导的制造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汽车工业。^⑤ 无论如何，根据马哈迪退休后的看法，由于文化的差异以及马来人缺乏积极学习的态度，这个政策的成效，最终不尽如人意，但马来西亚的确因此而作出了很大的改变。^⑥

虽然马哈迪从不隐藏他的马来族群主义，马哈迪任内的对外主张，却仍然多是以全体马来西亚人民为依归。对内，他以扮演马来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Malaya, 2003, pp. 74-140.

① 一份数据显示，1970 年至 2000 年马来 / 土著族群的专业人士数量增加了 10 倍，华人和印度人只分别倍加 6 倍和 5 倍。见 Shyamala Nagaraj and Lee Kiong Hock,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Reengineering: Which Part of the Field Are We Levelling?”, in Jahara Yahaya, Tey Nai Peng, Yeoh Kok Kheng (eds). 2003, pp. 16-70.

② Mahathir Mohamad, *A Doctor in the House*, pp. 199-200.

③ Mahathir Mohamad, *Reflections on Asian*, p. 37.

④ Ibid.

⑤ Barry Wain, *Malaysian Maverick*, p. 246.

⑥ Mahathir Mohamad, *A Doctor in the House*, pp. 382-387.

族群的斗士见称，对外，却是个雄辩滔滔的马来西亚领袖，或甚至亚非开发中国的代言人。因此，马哈迪的国家发展方针，如同孙中山一样，是多元化且功利性的，不管是应用伊斯兰，维系威权政权，抑或是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让马来人，和其他的马来西亚人带来尊严与荣耀，也让马来人，以及其他的马来西亚人能证明自己可以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平起平坐。^① 从这一点而言，联合其他国家以反抗“白人至上”的经济帝国主义，是有其必要的。因此我们不难发现终马哈迪的任期，他都极欲打造一个纯亚洲国家的经济区域组织（如东亚经济组织—EAEG），并抗拒澳洲和新西兰对东盟（ASEAN）的影响。

虽然如此，Barry Warren 认为马哈迪的反西方的外交言辞和作为主要还是为了用来掩护国内的政务，让执政党有借口诉诸民族主义来赢取马来西亚人的支持，这些激烈批判西方的言辞，通常也用以作转移国内政治危机的工具，^② 如面对西方媒体对马来西亚压迫人权的批评，马哈迪通常就以“白人族群主义”的偏见，或“帝国主义”来回应之，而非澄清事实。^③ 事实上，Barry Warren 认为，马来西亚并不如一般国家想象中的反对西方，马来西亚和美国、英国等都一直都存有一些军事合作的协议，有些更是秘密的军事协议。^④ 因此马哈迪的外交手腕，也存在着浓厚的策略算计，无论如何，它也成功地为马哈迪赢取正面的形象。

六、结论

Ernest Gellner 主张民族主义出现在经济与政治皆处于劣势，文化上能够自我辨识的族群，这些人因为这样的处境被迫走上民族主义的道路。^⑤ 可见，不管是杜撰还是真实存在，特定的外在威

① Mahathir Mohamad, *A Doctor in the House*, p. 159.

② Barry Wain, *Malaysian Maverick*, p. 255.

③ Ibid., pp. 244, 250.

④ Ibid., pp. 245, 251.

⑤ 葛尔纳，艾尼斯特著（Gellner, Ernest），李金梅译：《国族主义》（*Nationalism*），台北：联经，2000，第149页。

胁、恐惧与挑战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原由，因为它在根本上提供了族群团结和动员的能量。对此，孙中山先生认为要拯救民族，必要提倡民族主义，^① 因此，“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② 事实上，民族主义也是政府团结国民，凝聚国民意志的要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威胁，就如同反作用力，带动了世界各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也为民族主义国家的威权统治找到了相对统治正当性。

孙中山和马哈迪虽然是不同时代的政治领袖，但透过检验两人的论述与学说，我们可以发现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所传播的帝国主义从未消失，其种种特征仍然延续到今天。换言之，孙中山和马哈迪两人对帝国主义的内容和其特征皆有深刻的了解，足以提供吾人深入的参考。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亚洲国家独立自主，民族发展的最主要威胁，**它反映在政治上、经济上和价值文化上的压迫过程**。作为一个世代的开发中国家领袖，孙中山和马哈迪也深信强权就是公理的国际现实，因此也拥有务实的施政方针，即要利用帝国主义的支持来保护、壮大自己，又要团结弱小国家以防微杜渐；在这个背景之下，他们皆以有限度地抵制利伯维尔场经济，合理化若干威权制度的存在，声援其他亚洲弱小国家来作为反制西方帝国主义，巩固民族资本的主要手段。

更难能可贵的是，两人虽受教于西方的教育体制，亲眼见证帝国主义的霸气凌人，但却不迷信西方万能，在接纳西方的人文制度下，他们犹能发展出一套结合本土和西方价值，个人风格浓厚的治国观点，当中孙中山所秉持的理论泉源，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国大传统，同样在马哈迪背后的，也有深厚的伊斯兰信仰文化。这两大源自亚洲的古文明，不论在人文思想抑或物质成就上，都曾经远远超越西方文明，它们遂成为两大政治巨人对抗帝国主义的信心来源和价值基础。凡此种种，皆有值得亚洲诸国领导人的效法之处。惟两人的论述却有几个关键性的差异，而这些的差异，足以诠释两人在亚洲政治发展史上的差别地位。

首先，在个人的政治条件上，孙中山一生颠沛流离，并没有比

①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1册，第3-9页。

②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三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1册，第22-29页。

马哈迪更多的执政机会，只留下大量的著述。虽则其对帝国主义的了解，和因应而生的国家发展的理论，多有个人的创见，它们的大部份也都被证明是跨时代的真知灼见，当中展现的大气魄亦是动人心弦，惟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毕竟没有经过他本人的真正实行，而且只局部在战前的中国和战后的台湾推行过，作为一个企图让世人遵循的“金科玉律”，仍有其不足。再者以孙中山的实证精神，如果他有幸实行三民主义，其内容必会不断地修正，可能不如今日所遗留的样貌。反观马哈迪执政 22 年，他拥有更多的实践基础，但却没有完成一套系统化，环环相扣的治国论述，即使是在相对较完善的伊斯兰论述上面，也充满许多选择性的诠释，因此在治国的主张上，马哈迪并没有开创性的主张，他可说是一位相信“没有理论，就是最好的理论”的务实主义或功利主义者。

其次，孙中山和马哈迪彼此之间在治国的论述面和实践面皆有明显的差异之处，第一个差异，就是对民族主义信仰的差异。在实践上，孙中山是完成了汉人族群主义的革命，将满人政权彻底推翻，使汉人完全掌握政权，再强调国族主义的族群整合。因为此时对汉民族的威胁已非国内而是国外，以同化的手段联合国内其他民族来巩固国家认同，遂顺理成章地成为孙中山民族主义观的最后阶段。重要的是，孙中山反对强制力的同化政策，而是主张自然的同化，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民权主义的实施，每个人的权利和地位都是平等的。数千年的历史证明，将其他族群加以同化并不影响汉民族的主体特质，反而更加壮大汉民族的文化内容，这是孙中山强调同化的信心基础。

反之，马哈迪抗拒族群同化，努力巩固族群边界以维持一个在族群共治下，马来族群领导霸权的体制。在这个情况下，他对族群同化的国族主义观，纵然有所支持，亦是消极的。^① 因为担心破坏马来人固有的文化特质（按：换言之就是信心不足），马来人不愿意同化非马来人，反之非马来人也抗拒被马来人同化，如此一来各自的族群都徘徊在“族群优先”或“国族优先”的命题中打转，国家就在这种族群竞争又合作的态势下发展下去，因此所谓的国族，变成一个文化基础薄弱的马来西亚意识，这个现象在建构对抗帝国

^① 尽管他在 1991 年提出 2020 年先进国宏愿的目标，当中有提到打造马来西亚国族（*Bangsa Malaysia*），但很快的就被予以淡化。

主义以及巩固国民团结的论述上，是非常不利的。事实上，长期过度厚待马来族群的经济和政治方针，也早已让国内无数的非马来人菁英透过移民出走投入西方帝国主义的怀抱，一去而不回了。

换言之，孙中山一生所追求的，乃是实现三民主义，使全国人民成为一个达成政治经济权利真平等的国族，即“人人平等，同为一族，绝不能以少数人压多数人。人人有天赋之人权，不能以君主而奴隶臣民也。”^①而这种平等，根本不会因为族群出身的不同，或族群认同的歧异而有所差别。反之，马哈迪在任内透过加强实施各种偏袒单一族群的经济政策，^②再三维护甚至扩大了马来族群的特殊权利所施以的范围，不但加剧了国内族群待遇的不平等，也塑造了一批和执政党共生的马来富裕阶层，但随着马来族群比例的快速上升，^③在资源有限，以及缺乏民主制衡的环境下，这种偏袒单一族群的经济政策再也无法使更多的人受惠，最终得利的仍然只是占人口极少数的朋党。

至于孙中山和马哈迪治国观点的第二项主要的差异，就是对民主宪政的诠释。如前所述，孙中山很明确地反对“民主就只是选举”的主张，他所主张的民主体制，是立基于“平等和自由的主义”，在一定的时空下，孙中山也认可威权政府甚至是军政府的存在，惟它们的存在是有阶段性的，等到时机成熟，还是要实行“完全民主”的五权宪法。反之，马哈迪 22 年的治国生涯中，在国家没有大动乱的情况下，一再地修改宪法扩张首相署的行政权，国家

① 孙中山：〈欲改造新国家当实行三民主义〉，1922 年 1 月 4 日桂林广东同乡会欢迎会演讲，秦孝仪编，《国父全集》，第 3 册，第 306-308 页。

② 如对于他任内大力推动的国营企业私营化的政策，马哈迪就明白地说这个政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高土著的商业股票占有率。惟许多获得股票分配的土著却为了快速致富又把股票卖给非土著套利，因此最终土著的股票占有率仍然无法提升到预期的 30% 目标。见 Mahathir Mohamad, *The Way Forward*, pp. 89-108.

③ 在各族群出生率不变的情况下，预计马来西亚马来人和原住民的人口比例将会在 2020 年左右逼近 70%，2050 年左右更会超越全国人口的 80%，这个人口比例已与独立时期仅仅过半的比例相去极远，届时马来人和原住民的各项特权将会成为国内大多数人的普遍权益，已没有什么“特殊性”，而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无法持续提供如此众多人口的补助和优惠，因此最后所谓偏袒马来人的经济政策，受惠的将只是少数的马来族群和相关的朋党，当然，更会造成对少数族群的持续歧视，这种有违常理的政策，应有再被检讨的必要。

体制也日渐威权化，甚至日渐伊斯兰化，形成民主倒退的现象，而他个人却仍然坚信这个体制是为了马来西亚人民的福祉。他仅仅以马来西亚有“民主选举”的要件来判定马来西亚是民主体制的理由，也未免过于牵强。这种独特解释，实和孙中山的主张大异其趣，我们只能说，那是他个人独特的“亚洲价值观”了。

参考文献

1. Daniel Chirot & Clark McCauley 著，薛绚译：《为什么不杀光：政治大屠杀的秘思》（*Why Not Kill Them All: The Logic and Prevention of Mass Political Murder*），台北：立绪，2007。
2. 葛尔纳，艾尼斯特著（Gellner, Ernest），李金梅译：《国族主义》（*Nationalism*），台北：联经，2000。
3. 贺凌虚：《孙中山政治思想论集》，台北：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1995。
4. 华中兴：〈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本源初探：种族主义或国家民族主义〉，《思与言》，1992年30卷第2期。
5. Marie-Cleire Bergere（白吉尔）著，温洽益译：《孙逸仙》（*Sun Yat-Sen*），台北：时报，2010。
6.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台北：远流，1998。
7. 秦孝仪编：《国父全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
8. 王晓波编著：《孙中山思想研究》，台北：问津堂书局，2003。
9. 杨天石：〈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兼论清末民初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批评〉，《孙中山与民初政局》，台北：风云时代，2009。
10. 曾纪鑫：〈孙中山：民国之父〉，《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台北：远流，2009。
11. 张景云：〈华团与政治：解去政治化的前景〉，何启良编著：《当代大马华人政治省思》，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4。
12. 郑良树：〈保皇党及革命党对新马华教的影响比较〉，张希哲与陈三井主编：《华侨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1997。
13. 朱谌：〈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三民主义学报》，第15期，1992年。

14. 庄迪澎：《给马哈迪的媒体操控算帐：强势首相对弱势媒体》，吉隆坡：破媒体传播事业社，2004。
15. 庄政：《孙文思想与政略》，台北：国立编译馆，2001。
16. Anthony Brewer,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90.
17. A.P. Thornton, *Imperi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U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78.
18. Barbara Bush, *Imperi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6.
19. Barry Wain, *Malaysian Maverick: Mahathir Mohamad in Turbulent Tim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20. Bill Warren,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NLB, 1980.
21. Cheah Boon Kheng, *Malay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SEAS), 2002.
22. E.M. Winslow, *The Pattern of Imperialism: A Study in the Theories of Power*, New York: Octagon Book, 1972.
23. Govin Alagasari (ed.), *Mahathir: The Awakening*, Sabah: Uni-Strength Sdn. Bhd., 1994.
24. Gordon P. Means, *Malaysian Politics: The Second Gener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5. Hashim Makaruddin (ed.), *Islam and the Muslim Ummah: Selected Speeches of Mahathir*, Kuala Lumpur: Pelanduk Publication, 2000.
26. Home page for Paul Brians, http://public.wsu.edu/~wldciv/world_civ_reader/world_civ_reader_2/kipling.html, 2011年6月23日。
27. Hussin Mutalib, *Islam and Malay Ethnicity in Malay Politic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8. Hussin Mutalib, *Islam in Malaysia: From Revivalism to Islamic Stat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9. Iain Mclean,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0. Jahara Yahaya, Tey Nai Peng, Yeoh Kok Kheng (eds.), *Sustaining Growth, Enhancing Distribution: The NEP and NDP Revisited*. Kuala Lumpur: Centr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thnic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Malaya, 2003.
31. John A. Hodson, *Imperialism, A Study*, New York: James Pott and Co, 1902,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hobson/1902/imperialism/pt1ch1.htm>, 2011年6月23日。

32. Kamaruddin M. Said, *500 Tahun Melayu Menghadapi Cabaran* (马来人面临挑战五百年), Shah Alam: Kris Publications Sdn. Bhd, 2004.
33. Kamarulnizam Abdullah, *The Politics of Islam in Contemporary Malaysia*, Bangi: 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2003.
34. Khoo Boo Teik, *Paradoxes of Mahathism*,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esity Press, 1995.
35. Mahathir Mohamad, *A Doctor in the House: The Memoirs of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Kuala Lumpur: MPH Group Publishing Sdn. Bhd., 2011.
36. Mahathir Mohamad, *Islam: Misunderstood Religion*, Kuala Lumpur: Afro-Arab Centre, 1996.
37. Mahathir Mohamad, *Reflections of A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 2002.
38. Mahathir Mohamad, *The Malaysian System of Government*, Kuala Lumpur: Prime Minister's Office, 1995.
39. Mahathir Mohamad, *The Way Forward*,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8.
40. Norhashimah Mohd. Yasin, *Islamization / Malaynisation - A Study on the Role of Islamic Law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laysia 1969-1993*, Kuala Lumpur: A.S. Noordeen, 1996.
41. R.S. Milne & Diane K. Mauzy, *Malaysian Politics under Mahathir*, London: Routledge, 1999.
42. Sayyed Vali Reza Nasr, *Islamic Leviathan: Islam and the Making of State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3. Shanti Nair, *Islam in Malaysia Foreign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1997.
44. Sivamurugan Pandian, *Legasi Mahathir* (马哈迪的遗绪), Kuala Lumpur: Utusan Publications & Distributors Sdn. Bhd., 2005.
45. "Tantawi: Malaysia is a Model", *Bernama* (马新社), January, 17, 2008, <http://www.bernama.com.my/bernama/v3/news.php?id=314375>, 2008年3月4日。
46. Tham Seong Chee, *Malays and Modernization: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47. Tom Plate, *Conversation with Mahathir Mohamad: Doctor M: Operation Malaysia*,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2011.
48. V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London: Junius Publications Ltd, 1996.
50. Wan Mohd. & Hj. Nik Mustaffa (ed.), *Amanat Presiden* (主席的训词),

Kuala Lumpur: Fajar Bakti. 1997.

51. Yusof Ismail & Khayati Ibrahim (eds.), *Dasar-dasar Kerajaan Malaysia: Tinjauan Menyeluruh* (马来西亚政府政策：一个全面的观察) . Kuala Lumpur: A.S. Noordeen. 1993.
52. Zainuddin Maidin, Wan A. Hulaimi Trans. *The Other Side of Mahathir*, Kuala Lumpur: Utusan Publications & Distributors Sdn. Bhd, 1994.